

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素质与制度创新

辜胜阻, 郑凌云

(武汉大学 战略管理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辜胜阻(1956-),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人口流动与城镇化、高技术产业经济学研究; 郑凌云(1979-), 男, 湖北江陵人,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摘 要] 城镇化的发展有四个动力要素: 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功能、基于社会分工的产业基础、基于人口流动的素质、基于二元结构的城镇管理体制, 城镇化需要设立一种能为各种要素合理有效利用与耦合的制度, 通过机制创新实现城镇化战略管理。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 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对策。

[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 信息化; 城镇功能;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5-0541-07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城镇化发展一方面要依托大城市发展网络式城市化, 另一方面要依托农村地区的县城和中心城镇发展据点式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是指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下, 农村分散的人口、非农产业、资本要素向城镇集中的社会经济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城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向农村扩散, 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功能优化, 衍生出新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形态。城镇化的发展有四个动因: 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功能、基于社会分工的产业基础培育、基于人口流动的素质提高、基于二元结构的城镇化管理体制。其中, 适应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城镇功能转变, 是城镇结构优化升级和城镇发展素质提高的核心推动力; 产业基础培育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 基于社会分工基础的产业发展使城镇得以产生和发展; 人口流动中的素质提高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管理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城镇功能转变和基于分工的城镇产业培育的动态衍生过程。

一、城镇化发展的动因分析

(一) 城镇功能的变化是推进城镇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发展素质的核心。城镇功能的本质定位是发挥区域中心内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功能, 集散功能是指现代城镇对特定区域内经济社会等要素或资源的集聚和辐射, 它是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在能量交换上的吸引和扩散。

从功能考察, 历史上的城镇一般都是从作为手工业和商业的聚集地或统治者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农业革命而发生的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使城镇得以诞生, 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城镇是以土地财富和落后农业为基础, 以政治军事为主导, 家庭手工业和传

统商业规模小,工业发展落后,商人地位低下,导致城镇集聚经济功能低下。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古代城镇开始转变为现代城镇,也引起城镇化趋势,使城镇成为世界的主宰。大工业是一种具有高度协作性的共同劳动,这种共同劳动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一定地域集中,城镇的经济功能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发展对城镇的集聚要求。工业化过程之所以对城镇化产生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统一的要求。工业经济时期城镇的功能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功能之间以互不干扰的空间隔离为原则,功能内部以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为原则;二是不同城镇功能的联系和完成都要通过城镇可达性的道路网和共享性的城镇基础设施来实现。

如果说第一轮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动力的话,那么现代城镇化则以信息化为发动机。城镇发展在经历了城镇化(Urbanization)、郊外化(Sub-urbanization)和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三个阶段以后,转向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四阶段,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化阶段(Informationization-based Urbanization)。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化是更高级形式的城镇化。信息化给目前的城镇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如果说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集聚,郊外化和逆城镇化是一种扩散过程。那么信息时代的城镇化则是扩散与集聚功能共存,并交织演进。信息化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监督成本,而且生产管理在空间上分离成为可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进行管理与控制。管理控制功能向中心区集中,生产向边缘低成本地区分散。城镇的部分功能转由信息网络承担,城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中小城镇和城镇的边缘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信息能够通过降低成本允许社会经济活动分散,但远程通信不能完全代替城镇作为信息极的“集聚”功能,信息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同样追求集聚效应。信息化时代的集聚不同于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的集聚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企业或企业内管理、控制和协调等职能和价值链环节逐渐向城镇中心区集聚。

(二)产业基础是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和促进城镇化内涵发展的战略要素。城镇发展,尤其是城镇功能的发挥是由分工决定的。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分工和分工所决定的城镇发展和城镇功能也不同。在一定的时期,城镇发展、城镇功能寓于城镇产业之中,即城镇发展和城镇功能必须通过产业结构体现出来。明确且处理好主导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配置最佳的产业结构,是发挥城镇功能作用的关键所在。

产业基础是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要素,即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城镇化发展素质。产业结构的演进会通过城镇形态和城镇规模变化的传导,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在工业化初期,产业结构比较落后单一,主导产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间的联系较少,依存度较低,因此,城镇规模都较小,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到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依存度提高,导致产业在空间积聚范围上迅速扩大,引起城镇化过程加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计算机、生物制药产业等迅速崛起,产业结构高度化,同时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对城镇生活产生了新的要求以及生产现代化对城镇服务设施的需求更多。因此,城镇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发展,赋予了城镇新的活力,也使城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探讨信息化时代城镇中产业发展趋势以外,培育农村城镇化的产业基础还在于继续推进农村工业化,其中农业产业化是工业化的体现和实现形式,能有效实现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注重从基本的农业生产入手,延长农业生产链条,使农业从纯生产型向农工商、产工贸等一体化形式型转变,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优化产业结构。而城镇化却是从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入手,通过产业的聚集,从而带动人口集中,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中的龙头企业提供理想的集聚地,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供条件,为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同时通过对城镇经济的接受和延伸,促进城乡经济大循环。

(三)以素质为导向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城镇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动态演进的综合过程,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人口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口流动特别是乡村—城镇人口迁移,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

长期以来,国内外著名学者对人口迁移流动做出了大量研究,认为农村—城市人口流动有两种形

式: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张培刚先生通过研究美国农场劳动力向城镇工厂的转移指出: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绝不是直接的、立即的、畅通无阻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骤是一种“农场—乡村工业—城镇工业”的间接转移方式。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可以直接进入城市现代工厂的,即人口的迁移是一种“农村农业部门—城市现代部门”的直接转移。从上可以看出,不论是间接转移还是直接转移,都只涉及了人口数量结构在地域空间的转移和劳动职业在产业之间的变化。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和无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城镇化是一个文化进步的过程,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现代文明向农村普及的过程。这一过程除了要求城镇功能得以转变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人口的流动和人口城镇化来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素质反映了城镇的文明状况,人口城镇化既包括人口城乡之间的合理有序的流动,也包括农村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素质提高。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还会提高城镇化的内涵高度。城镇化发展受人口生育率水平和人口素质的影响,人口流动作为人口系统开放性的最深刻体现,具有“双重效应”,一是降低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生育水平效应,二是提高人口素质效应。在素质导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加快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推动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地区渗透和扩散,传统乡村文明走向现代城镇文明,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人”的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现代化。

(四)管理体制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变量。中国城镇化发展是中国城市发展方针及其政策的直接反映,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深深打上了国家城镇管理体制的烙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选择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两次探索,形成了城镇化发展理论的两创。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面对重构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双重目标,中国选择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国家为主导,以工业化推进和农业大发展为前提,以重点建设城市为突破口的新型的(不同于封建经济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时期)发展道路。城市作为工业化的载体,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重点,由此促成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城市化道路受国家城镇管理体制影响,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发展特征。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原有城市化发展道路进行了重大调整和创新,选择了重点发展小城镇,发挥市场机制,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以及农村第二产业(乡镇企业)、城市第三产业的多元化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因此,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而城镇管理体制是影响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从发展绩效而言,城镇化健康迅速发展要求的城镇管理体制应该是一种能够有效促进要素流转配置的制度。我国城镇管理体制不仅表现为二元城镇化:社会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还表现为城市人口的二元性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村进城经商务工的人口不能获得正式城镇居民身份,连他们的子女也不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就学和就业等发展机会。完善我国农村城镇化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协调平等的管理体制。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现实问题

农村城镇化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我国农村现有建制小城镇1.9万多个,居住人口1.7亿。此外,我国尚有近3万个集镇,拥有人口5000多万。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是,也应看到农村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气弱,缺乏产业支撑。在当前一些城镇建设中,由于政府推动力过强,市场作用力太弱,一些地方忽视了对本地区支柱产业的培育,就业能力弱。统计表明,在现有的1.9万个小型城镇中,平均就业人口为城镇总人口的26%。而我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一比重为60%,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63%,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66%,20万—5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56%。一些城镇既缺乏第二产业的依托,更缺少第三产业的支撑。目前,我国城镇一、

二、三产业结构比为 78 :12 :10, 乡镇区非农业人口只占镇区总人口的 45.8%。(2)布局散, 缺乏集聚效应。一些地方不顾条件, 一哄而上, 遍地开花, 在数量上盲目扩张, 齐头并进, 布局分散, 摊子铺得过大过宽。一些地区乡镇企业、村庄和小城镇犹如满天散落的星斗。据统计, 我国现有乡镇企业 80%以上分布在村庄, 18%分布在集镇, 另有 2%分布在县城以上。过于分散的产业布局使乡村工业布局分散化、规模细小化、人际关系亲缘化、经营管理封闭化。(3)成本高, 缺少启动资本。一方面, 城镇化面临资本短缺, 农民迁移和身份转换的启动资本严重不足。在我国农村, 由于对财产权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农民大量资产——房子、土地等无法资本化, 财产只能在狭小范围内交易, 不能用作贷款抵押, 也不能作为投资入股。在创业资本需求的满足方面, 流动人口无法运用自有资产作抵押得到城市金融支持。另一方面, 由于义务教育重心下移, 城镇财政要供养大批教师, 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工资 80%来自向农民的收费, 而城镇财政支撑的人头费高致使农民进城成本很高。(4)功能弱, 缺少城镇化氛围。有的城镇建设缺水少电, 信息等基础设施不配套。有的地方注重城镇的“硬件”设施建设, 忽视软件环境; 注重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 忽视城镇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有一些地方注重“有形市场”的建设, 忽视软环境的配套和管理, 认为“有形市场”的设施一旦建成, 大市场、大流通、大发展就会接踵而来, 水到渠成。结果事与愿违, 出现有场无市, 或有市无序的现象。有人把这种局面称为: “走了一村又一村, 村村是城市; 看了一镇又一镇, 镇镇是农村”。(5)规划差, 缺乏建设管理经验。有的城镇建设盲目地划地盘、铺摊子、增投资、造房子, 搞“遍地开花”式的快速建设和开发。有的盲目照搬其它地方的模式, 盲目攀比, 盲目建“大都市”。一些地方建筑物见缝插针, 杂乱无章, “一片繁荣, 一片混乱”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地方在建设资金的筹措上一味死守“等、靠、要”的老一套, 资金到位难, 大量工程沦为“胡子工程”。由于缺乏规划指导, 致使小城镇建设出现“一年建, 二年改, 三年推倒再重来”现象。(6)素质低, 缺乏城市先进文化。有的城镇化新居民素质低、精神生活贫乏, 文化糟粕乘虚而入, 封建迷信抬头, 腐朽思想蔓延, 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社会治安混乱, 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人与城市环境格格不入, 倍受城市原有人口的歧视, 缺乏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多人表现出与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的落后、狭隘、封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社会交往上, 仍奉行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交往方式。(7)缺少平等体制, 流入人口处于体制外生存状态。流入人口为流入地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但不能在流入地公平地享受到应得的利益, 他们在户口、就业、生产经营、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就学、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处于无法被流入地充分接纳的体制外生存状态。“流民”处于漂流不定的“浮动”状态, 对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怀有不稳定心理, 短期行为严重。(8)环保意识弱, 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在城镇化进程中忽视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有的地方建低水平建筑, 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有些地方上低效益的乡镇企业项目, 造成环境污染。有的地区对农村住房建设管理严重失控, 宅基地面积越占越大。一些小城镇搞“圈地运动”, 土地资源浪费越来越严重。有的新居民乱搭乱建, 乱停乱放, 造成污水满街流, 垃圾满天飞。

三、提高农村城镇化发展素质的制度创新

如前所述, 功能构造、产业基础、人口素质、管理体制是城镇化的四个动力要素。城镇化需要设立一种能为各种要素合理有效利用与耦合的制度, 通过机制创新实现城镇化战略的有效管理。城镇化要素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关系可以用图 1 表述。针对城镇化的四个动力要素和农村城镇化的问题, 需要进行四方面的创新。

(一)提升城镇功能, 应对信息化挑战, 重视网络经济影响, 实现农村城镇化跨越式发展。信息社会有六大要素决定着信息源和信息宿。它们是信息网络、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法规环境与信息人才。信息源和信息宿的关系可以图示(图 2)如下。信息化对城镇功能构造影响最大的是城市信息化。信息化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改变城市生产方式, 促进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二是通过改变城市管理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三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居民生活的知识化,从而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要研究怎样把大都市建成信息增长极和信息源,怎样把农村城镇建设成为信息宿这两个问题。城市是信息传递的第一节点和信息产生的源头,相应的是各个城市之间形成具有良好信息交流通道的圈层,特别是在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需要建立众多小城市和城镇支撑,一是参与到大城市的分工体系中去,二是接受大城市的信息流,成为具有消化信息能力的信息宿。为了适应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城镇化的需要,要让发展较好的大都市先行,把大都市建成信息增长极和信息

源,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扩散效应和信息的渗透作用,带动社会信息化的实现。信息化背景下,网络设施为最大的投资方向之一,信息产业和服务成为最大的消费热点,城镇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化,信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因此,需要变革城镇建设和管理方式,促进城镇从“工业制造中心”、“商业信息中心”转为“信息流通中心”、“信息管理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同时,提高农村城镇作为信息宿的对信息资源接受、处理、利用、加工能力,加快农村城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网络发展定单农业,鼓励利用先进网络检索工具开发农业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推行“农村建网、农民上网”工程,提高信息化意识和技能,对农民进行持续的信息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农村人口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自觉学习网络基本操作,以提高现代农民面向信息化时代的基本素质。

(二)进行城镇产业发展机制创新,集聚生产要素,形成城镇化“人气”,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

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只是唱“空城计”。因此,一方面,要运用市场化机制,用经营城镇的理念来建设城镇、营运城镇,把经营意识贯穿到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引导分散的第三产业和具有发展前途的乡镇工业向相对集中的方向发展,进而为进城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基于市场比较优势的发挥,发展城镇化的多元产业支撑。未来城镇产业的发展可采取农业服务牵引型、工业催生型、城市辐射型、旅游开发型、矿产资源型、流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型、工贸综合型等多种模式。选择城镇产业发展的主导类型,抓住已经和正在形成的特色产业,使城镇建设得到有力的产业支撑,从而形成人口、资本等要素的合理集聚,要营建三种机制。一是要素集聚机制。一切生产要素的聚散、重组都是为了以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大的效益。促进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的地域集聚以形成坚实的产业基础,是城镇化存在的前提。为了引导企业、资本、就业人口向城镇集中,政府要顺应企业和城镇发展的要求,做好规划、组织、协调、服务工作,保障企业有良好的经营环境;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使企业利用正向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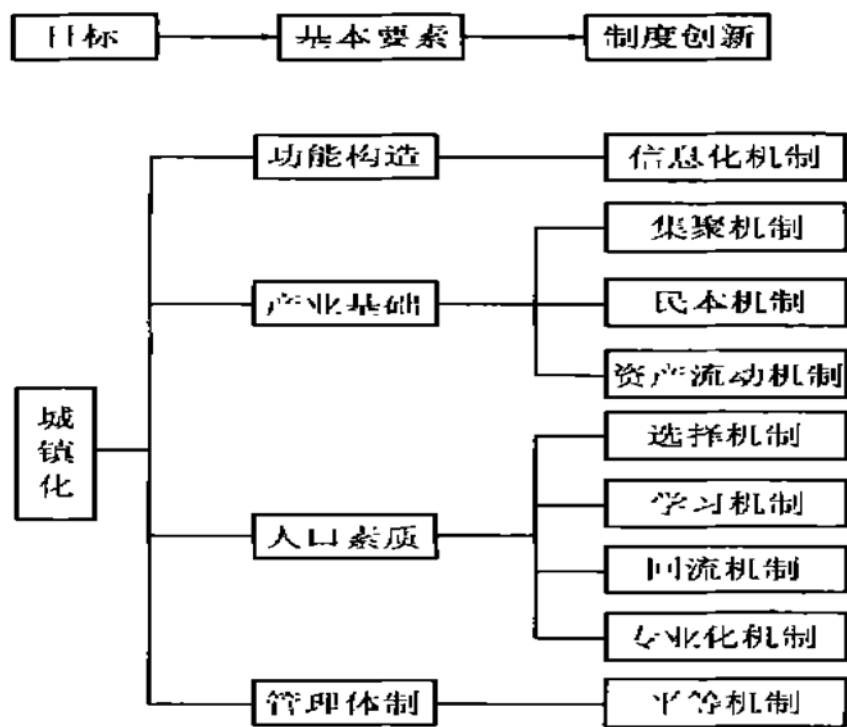


图1 城镇化基本要素与制度创新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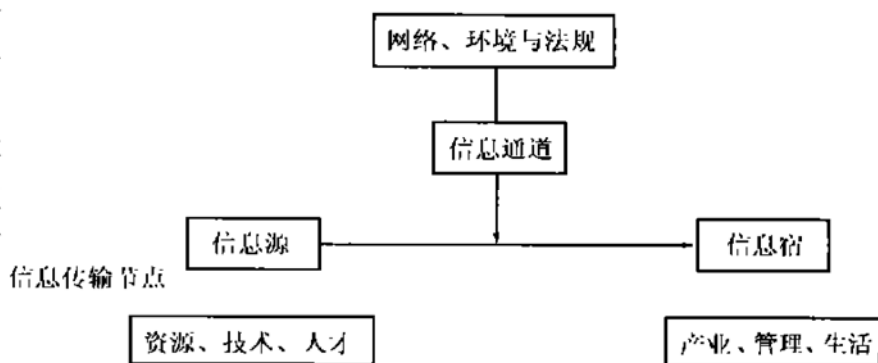


图2 信息化基本要素、节点与通道

效应;使企业通过集聚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二是民本发动机制。要高度重视民间发动型机制和民本经济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依靠广大民众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发展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要考虑如何利用规模巨大的民有资本发展城镇化;增强城镇居民主体地位,拓宽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决策和公益事业决策的渠道。三是资产流动机制。在市场化思路指导下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使农民手中的资产资本化,允许土地及其附着物可以合法地出售、出租、抵押、传承和馈赠,切实解决城镇化的资本短缺问题。

(三)进行人口流动机制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人口素质,把城镇化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人口素质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素质。为了提高人口素质,需要营建四种机制。一是人口选择机制。根据我国国情和城乡人口结构现状,需要确立一种以经济导向(鼓励进城农民到城市投资兴办产业)、人口素质导向(优先让有较高文化程度和具有从事非农产业经验的农民进城)和社会规范导向(限制在农村不遵守社会规范的农民如违法犯罪者、违背计划生育政策者进城)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综合方案,以推进乡城人口流动。这既可以解决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又可以推进人口的现代化和城乡人口结构的优化。二是学习发展机制。人口流动本身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校。通过岗位学习和职业训练提高转移劳动力的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就业需要,增强在城市的稳定感。岗位学习和职业训练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延缓和减少了素质偏低的劳动力的供给,创造出更多的岗位需求,扩大就业需求,从而能极大地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巨大压力。三是能人回流机制。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航”建设农村城镇,支持他们领办、创办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人才不足问题,形成洼地效应和回流机制。四是专业化机制。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让进城农民摆脱“兼业化”倾向,要促使转移劳动力的土地向种田能手的集中,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留守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城市化。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育、造就一个懂经营、会管理的农场主阶层,逐步将传统的家庭式生产组织改造为企业式农场。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化提高进城农民的素质,另一方面又可改变进城农民脚踏“两只船”而使土地抛荒和资源大量浪费的局面。

(四)进行城镇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平等体制,保障城镇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城镇流动人口的体制外生存现状。我国实行一种通过把人分为有户籍的市民和无户籍的流民的二元城镇化管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管理体制。因此,迫切需要建设同化平等机制通过给予城镇化人口以“市民”待遇,以解决进城人口与原居民之间的差异问题。营建同化平等机制,一是保障城镇流动人口中的数以百万计的适龄少年儿童享受当地城市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二是逐步建立适应人口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解决城市定居新居民的体制外生存和漂流不定的“浮动”状态问题,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消除内外体制分割造成的社会离心状态。将流动人口从体制外纳入到城市体制内社会生活中,提高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克服民工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和社会分割状况。

[参 考 文 献]

- [1] 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2] 费景汉,拉尼斯. 劳动剩余经济发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3]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上卷[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 [4] 辜胜阻.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5] 辜胜阻,简新华.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 [6] 辜胜阻,刘传江. 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 [7] 顾朝林. 中国城市地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8] 辜胜阻,郑凌云. 人口逆淘汰与城镇化制度安排[J]. 中国人口科学,2002,(5).
- [9] 张永丽. 信息化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4).
- [10] 申 伦. 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快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J], 热点研究,2001,(1).

- [11] 任宗哲. 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关系探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 (2).
- [12] 王 颖. 信息网络影响下的城市[J]. 城市规划, 1999, (8).
- [13] 李 芸. 差异化城市功能的定位与战略设计[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 (8).
- [14] 庞亚君. 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DB/OL]. 国研网, 2002-09-10.

(责任编辑 邹惠卿)

Rur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U Sheng-zu, ZHENG Ling-yun

(Strategy Management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GU Sheng-zu (1956-),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trategy Management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a's economy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cs of Hi-tech industry; ZHENG Ling-yun (1979-), male, Graduate, Strategy Management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dustrial economics.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dynamic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ity func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ization, industrial foundation based on social division, population quality based on migration,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dual-struc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nnovate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by using and integrating the factors effectively. With detailed analyses of the realistic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rural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rur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urban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city func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